

## ■聚焦 贺享雍“乡村志”系列:

## 土地上生长的作家

□雷达

贺享雍一向被称作“农民作家”，自言其作品“土里土气，土得掉渣”。事情当然并不像他自谦的那样简单。他从事写作已20多年，甚好评；近些年，专攻长篇小说，致力于营构一个宏大的系列《乡村志》，目前已完成了《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非非》《大城小城》等8部长篇，整个系列拟由10部构成。他自己说，要“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雄心可见！让人想起巴尔扎克要做法兰西历史书记官的宏愿。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数量之大，凡读过一两部或多部的读者和评论者都发现，贺享雍的这些作品并不是“急就章”、“凑数章”、“跃进章”，各部作品都有独异的主角、丰富的细节、完整的构思，可谓血肉丰满，趣味横生，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比起时下某些叫好的长篇并不差。虽然“实录”色彩浓了些，但部部好看，各有亮点。

在我国乡土文学创作史上，似乎还没有人创作出篇幅如此浩繁，规模如此庞大，围绕同一块小地方（川东贺家湾）展开长达10卷本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提供了巨幅的中国乡村的生活风俗画卷，并能真实深刻地表现当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及其变化，它们涵盖了农村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一存在，就需要认真地加以评价了。简单的判断或绕开它，不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首先要充分肯定贺享雍迷恋乡土文学创作几十年，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刻苦精神。贺享雍务农30年，做过10年乡村两级干部，从未脱离过故乡的土地，是一个地道从土地上生长的作家，他的生命之根和文学理想都深扎于泥土之中。他的创作数量确乎惊人，“乡村志”里的八九部长篇小说，仅是他2013年以来的产品。没有源源不断的活水、长期的累积、层出不穷的发现、旺盛的精力，是断然完不成如此重任的。

我们会发现，贺享雍的乡土小说，其视角与其他写乡土生活的作家都不一样。他肯定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侨寓”的、回望的、乡愁和悲悯交加的“乡土文学”。他与贾平凹那样地道的农家子弟，后来进了城，视故乡为精神家园，用身体和灵魂去不断亲近民间的作家不同。他与莫言那样出身农民，离开乡土又回过头来，借乡土展现奔腾的梦想、恣狂的笔墨的作家也不同。“高密东北乡”和“贺家湾”都是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小世界”，但它们的性质迥然不同。

不必再举下去了。我认为贺享雍是作家的眼光与农民眼光的交织，甚至还掺杂着农村干部的眼光。这构成了他观察、体验和表现的独特角度。农民化的眼光是由内向外的内视角。以“农民式”的平视眼光阅读乡村的历史与人事，并在写作实践中客观地“还原”乡村的真实图景和自在状态，如有人指出的，它打开了乡村生活中那些有形和无形、显性与隐性的奇特空间和隐蔽角落，从中发出乡村自在的声音。然而，不管他怎样的“农民”化，也得承认，作家的眼光毕竟是最主要的，他得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他得提炼、剪裁、设计、架构，他须得胸中有时代的和现实生活的全局，方能俯视贺家湾农民的小圈子，创造出一个个平行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完成从生活到艺术的提升过程。过分强调他的农民眼光，若以为只是喋喋不休、唠叨叨地诉苦，那根本写不出任何像样的作品。

现在读者普遍的感受是，贺享雍的小说很好看，拿起放不下，能紧紧吸引人；他的小说幽默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常想发笑，但又酸楚、沉重、笑不起来；他在该下判断的时候往往沉默，叙述者的态度总是隐藏起来；他的小说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善恶恶纠缠在一起。他的小说具有原生态、生活流的一面，像生活

贺享雍是作家的眼光与农民眼光的交织，甚至还掺杂着农村干部的眼光。这构成了他观察、体验和表现的独特角度。

宏大的《乡村志》系列写到现在，有什么缺陷和不足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贺享雍过去写小说，只是写小说，只有文的要求，现在增加了史志的要求，不得不考虑“全景性”、“史诗性”，考虑题材布局方方面面，文的追求和史的任务有时可能“打架”。这就有可能发生主题先行或题材先行。

本身一样血肉丰满，经络纵横；但又并非照搬生活，而有精细的加工提炼。他的小说表面上平静，却内蕴着惊心动魄。

所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贺享雍的小说为什么好看富于魅力，其奥秘何在？在我看来，首先是深刻的真实性。不是表面的真实，而是人心的真实，不回避、不掩饰，把农民的艰辛和奋进如实道来，体贴入微，一腔忧国忧民。正如有人说的，“贺享雍的小说坦率得令人心惊肉跳”。当今现实中的政治生态，在这些作品中占了重要位置。如《民意在天》，围绕怀抱政治热情、力图改变家乡面貌的贺端阳，三次竞选贺家湾村委会主任的曲折经历，其如何与官场潜规则，与宗族关系、亲房利益、黑恶势力较量，情节起伏跌宕，险象环生，难以尽言。这些真实的描写，对于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如果他的小说，只是外敷一层川东乡土的风光、风俗、风情，不痛不痒，没有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风骨，还能这么动人吗？

其二是它的复杂性。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利益博弈中推动叙事，刻画人物。读他的小说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事件冒出来，你以为几经曲折解决了，其实不然，背后定然有想象不到的连环套在等着你。可以说，它们的“水很深”。仍以《是非非》为例。贺家湾两件大事，一是修路，二是砍树与护林，每项办事两大族互不相让，大房与小房明争暗斗，让贺端阳好不头疼；而乡一级与村一级的利益之争，更是紧张激烈。为了得到应得的修路款，贺端阳与乡党委书记马前进“掰腕子”，展开几大回合较量，斗智斗勇，用尽了全力。后面的砍树风波更是波澜迭起，让人惊讶不已。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官、村上与乡上、乡上与县上、村民与奸商、村官与黑社会，矛盾重重叠加。贺



端阳、贺松劲他们，既要与只图表面政绩，扣留和挪用修路款的乡干部周旋，又要对付唯利是图、两面三刀的奸商，甚至要面对黑社会的刀子，还要努力团结已变得难以团结的村民。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叹，村官难当，奸官更难当。这样的小说看起来自然刺激有趣。

贺享雍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人物性格与其个性化语言的统一，以至浑一。什么人说什么话。川东方言俗语运用得纯熟自如，绵柔且有劲道。这很自然地让人推想到，他大约受《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影响甚深。在情节安排、悬念设置上，他更是汲取了演义小说、传奇小说、世情小说的技巧，高潮不断，善于吊住读者胃口。有时“叙述人”直接变成了“说书人”。

宏大的“乡村志”系列写到现在，有什么缺陷和不足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贺享雍过去写小说，只是写小说，只有文的要求，现在增加了史志的要求，不得不考虑“全景性”、“史诗性”，考虑题材布局的方方面面，文的追求和史的任务有时可能“打架”。比如，也许并非不吐不快之作，却因为占据了三个方面，勉强去写，只为了史的框架的完整。这就有可能发生主题先行或题材先行了。另一方面，作者给自己规定的表演方式是“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看他已经发表的几部，并非都是实录方式，小说性还是很强，不知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实录方式”？作者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否偏高了，这样写来也许轻松，但弄得不好，会变成乡村故事大全。

历史正在呼啸前进，新时代的生活日新更新，同步性与历史性很难取得完全一致，时间不会凝固，任何“志书”都只能是阶段性的。总的看来，贺享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就，目前对他作品的研究和评价不够，就是常说的“低估了”。希望“乡村志”系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 ■关 注

生态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生态文学”的出现，与“乡土小说”的出现一样，实际上是现代性冲击传统社会的一种表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人的自我膨胀和向自然界的无限度扩张，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

“乡土小说”肇始于鲁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生态文学”也肇始于鲁迅，却往往被人们忽略。鲁迅在《故事新编》里的《奔月》中有明确的生态意识，羿箭法高超，但是他不顾后果地猎杀动物，破坏了他赖以生存的生态结构，最后落得个只能吃鸟鸦炸酱面的下场。

自鲁迅以后，“乡土小说”出现了众多作家，也分出了许多支流，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枝繁叶茂的类型。但是“生态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影响力有限。即便是在鲁迅研究当中，《奔月》的生态意识也很少受到关注。究其原因，还是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程有关。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经济问题而展开，“乡土小说”首先内涵着经济主题，其次它还密切关联着政治主题。经济的主题是发展，是物质的匮乏与“富”起来的渴望。物质匮乏使人们无暇顾及生态问题。

20世纪末，生态意识的再次出现，是经济主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儿》等作品当中，已经蕴含了生态意识，这时候的生态意识，是以生态恶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虽然出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但是还没有明确地成为作家要表达的显主题。

生态问题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主要是新世纪以来的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物质匮乏的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经济与环境的矛盾也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在当代文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其中欧阳黔森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欧阳黔森的《水晶山谷》《水的眼泪》《莽昆仑》《绝地逢生》都是非常突出的生态主题创作。《水晶山谷》写山村青年田茂林先在金钱的诱惑下挖掘三叶虫化石，破坏七色谷，继而在未婚妻白梨花的影响下，为了保护水晶矿体而牺牲的故事。《水的眼泪》以南海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对比，写了水对人类的重要性。《莽昆仑》以散文小说的形式，写了昆仑山的生态之美，构成了一部昆仑山的大型组诗。《绝地逢生》写了贵州盘江地区的人们通过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的方式与石漠化斗争的故事。

在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中，欧阳黔森是少见的具有地质学眼光的作家。这种地质学眼光，决定了欧阳黔森生态文学创作的两个区别性特征。

首先，欧阳黔森生态文学创作中的时间形式是一种“地质时间”，这种时间是以亿年为单位的。所谓的“地质时间”，是地质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一种地质的“生命时间”。人的生命从有到无，通常来说不过“百年”。庄子在《逍遥游》中曾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可即使这样的人生时间，与地质时间相比，还是周期太短了。地质的生命时间是以亿万年为单位的。《水晶山谷》中的三叶虫生活在二亿年前、七色谷的漂亮石头形成于七亿年前、紫袍玉带产生于距今约十亿年。《水的眼泪》中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莽昆仑》中古老的昆仑山都有不知多少亿年的历史。在人类自身百年的时间长度和亿万年时间长度之间的对比中，人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体验到自然的崇高之美，也不能不感受到对自然的敬畏。亿万年的时间单位中，生态恶化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人类生存的困境，以及人类在生态恶化地区的消失。在这种时间形式中，生态和人类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不是这种亿万年的时间形式中，而是在社会时间形式中，以几十年、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为单位，生态与人类的关系往往就没有那么明显，那么触目惊心。人类也就更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对生态问题麻木大意。

其次，从叙述上来说，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通常以“相遇”作为基本形式。也许与欧阳黔森的生命体验有关，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个地质队员形象，这个“地质队员”或者作为承担叙述功能人物形象，或者作为普通人物形象，总之，这是一类“寻觅者”。那些远离喧嚣的、崇高的生态之美正是通过与这样的寻觅者相遇，才呈现在人们的意识当中的。在《莽昆仑》中欧阳黔森无意间道出了这种“相遇”美学的秘密：毫无疑问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渴望奇迹，可奇迹从来都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不断地在寻觅中跋涉中路遇。这路遇也不是有路就有，往往是没有路才有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人照亮了自然物的存在，这尤其体现在《莽昆仑》上。如果不是地质队的到来，如果不是地质队中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昆仑山的神鹰、雪豹、雪狼等生态之美就只能寂静地作为不为人知的存在。人与生态的相遇照亮了生态之美，生态之美给人带来了震惊体验。

欧阳黔森的《绝地逢生》写了贵州盘江地区人民通过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与石漠化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浪漫主义英雄故事。这在生态文学中是少有的。人类在面对生态恶化时扭转局势，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事迹，也是贵州精神的体现。

从整体来说，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表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破坏的忧虑。在罗布泊要建钾盐生产基地，需要大量用水，地质队找到水以后，大量的工业用水又可能对罗布泊的地下水造成致命的污染。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人类与生态一体化的博大情怀。人类不仅离不开土壤和水，而且与神鹰、雪狼、黑熊等动物也能和谐相处。

中国社会“富起来”以后，进入了新时代。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示出了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 生态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

□朱永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月11日，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蓝盔》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张显、杨峥、李京盛、赵彤、丁临一、边国立、赵卫国、李勤、彭澎等专家学者、出品方代表和剧组主创人员与会研讨。

近年来，中国军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维和战场上，中国蓝盔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维和题材电视剧《蓝盔》由陆军政治工作部出品，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有限公司、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北京春秋风云影视策划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影视、腾讯影业联合出品。该剧讲述了中国陆军维和部队青年军人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期间经历生死考验、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获得联合国认可与褒奖的故事，展示了新一代中国青年、中国军人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强的意志品质与过硬的军事素养，展现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彰显了大国担当和国家形象。与会者围绕该剧创作各抒己见，如何打造兼具主题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现实主义军旅题材电视剧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

据介绍，《蓝盔》从立项到剧本完成历时一年半，前后进行了6次修改讨论，其间还专门邀请参加过维和任务的专家提出修改建议。在剧本创作初期，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组织创作班组等一行十余人行程上万公里，到曾参加过维和任务的5支部队进行了采访体验，与近百名官兵面对面座谈，为剧本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

据悉，该剧作为陆军政治工作部2018年重点打造项目，计划于上半年开机拍摄，年内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2月23日至25日，首届香雪海诗会在苏州举行。此次诗会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江苏作协诗歌工作委员会主办，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人民政府、吴中区文联承办。叶延滨、范小青、汪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诗人参加诗会。

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苏州赏梅胜地，感受梅花带来的诗歌灵感。大家还走进司徒庙，探寻庙里千年古柏的“清、奇、古、怪”，走访圣恩寺、铜观音寺，体验当地庙会的盛况。诗会期间还举行了诗歌交流和朗诵活动，梁晓明、谷禾、雁西、程维、育邦、苏野等诗人朗诵了关于梅花或江南的作品，烘托出江南的盎然春意。大家在交流中谈到，诗人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来到苏州，江南早春的光影浮动不断撞击心灵，赏梅吟诗正当时，要把在诗会中的收获转化为笔下灵动的文字。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月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百胜集团旗下肯德基公司联合举办的“国宝耀中华”系列活动在国博启动。活动期间，肯德基将在全国各地选择18个主要城市的重点门店开展相关主题宣传活动，向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消费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国家博物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有

## 《我的父亲我的兵》央视开播

本报讯 由杜军执导，张一山、刘威、程琤、傅森等主演的电视剧《我的父亲我的兵》2月25日起登陆央视八套黄金强档。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八路军连长付子龙临危受命，和日寇展开激战，在战斗过程中遇到了失散多年的逃兵父亲田守义，两人既斗智斗勇又携手共进，最终父子联手粉碎敌人阴谋的故事。该剧在刻画历史和英雄的同时，塑造了一群青年人的鲜活形象，并用丰富饱满的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将人物的成长、队伍的壮大和同仇敌忾的精神，艺术而真实地呈现出来。

杜军介绍说，该剧突出信念理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创作情感投入到讴歌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不甘心被压迫、不甘心被奴役的英雄事迹中，彰显“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坚定信念，力求告诉观众这是怎样的一段抗争史。

(央讯)

## “国宝耀中华”让文物活起来

机融合，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2016年，国博开始着力打造“文创中国”授权平台，力图构建一个通过文化资源(馆藏IP)授权和产业资源合理对接、互惠共赢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模式。肯德基正是借助“文创中国”平台获得了国博17件馆藏文物IP的授权。此次活动期间，肯德基

将通过对后母戊鼎、四羊方尊、东汉陶船、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等国博馆藏文物形象的开发，结合最新科技手段打造文化体验感十足的“国宝耀中华”主题餐厅。主办方表示，希望此举让广大青少年充分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传统文化的内涵，让中华文明的恒久之光温暖当代人的生活时空。

## 李禾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李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4岁。

李禾，中共党员。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人生的开篇》《危险年龄》《触摸前面的世界》《贾闲人闲传》《空心草》《我们家的故事》等。

## 杨光治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杨光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杨光治，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诗艺·诗美·诗魂》《野诗谈趣》《唐宋词今译》《引你入诗坛》《千家诗评析》，散文《蝴蝶梦》《触动心灵》，随笔杂文集《不吐不快》等。

## 江一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江一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5日在浙江逝世，享年55岁。

江一郎，原名江健。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风中的灯笼》《山地书》等。